

紫藤十六年

嚴月蓮、姚偉明

做實質工作的人其實沒有時間去看自己以前做過的事情。不過參加這個會議好像就要坦白交代一些個人歷史，所以我也得回頭去看看做過的事情。

我在賣淫這個行業做組織工作，自己覺得沒有受到很大的壓迫，這可能跟我的出身背景有關。我十二歲就在工廠裡面工作，二十六歲開始加入做工會的工作，一直做到開始做賣淫組織，我只有小學畢業，從小就在工廠工作，所以學術界的人不會跟我對話，因為他們覺得我什麼都不懂。對！我就是什麼都不懂。我記得在做賣淫組織以前，我成立了另外一個機構叫「女工協會」，當時有些女性主義的團體還來問我一個問題，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她們在問什麼，她們問：「你這個組織是做女性裡面的勞工，還是做勞工裡面的婦女？」我不懂這是在問什麼，所以她們就覺得沒辦法跟我對話，覺得說不通。我也覺得那很好，我才懶的理你們。

我真正加入賣淫這個行業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在和立法局打仗，因為當時香港規定十二歲以下的小孩如果單獨留在家裡，出了任何事情，母親要負責。我們一堆女人就去立法局門口鬧

，我們說，要不就政府給我們聘保姆，要不就在香港遍地提供幼兒園照顧我們的小孩，法律不能這樣不顧我們現實生活裡媽媽們的狀態。這時候我們這些做組織工作的人之中，我是一個很能吵的人，什麼都不怕。有一次，宗教團體來跟我說話，她們就對我說，賣淫是不行的，是商品化，而且沒有人喜歡做這個行業的，都是被迫的。我就跟她們說，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吵了很久了，既然你說她們都是被迫，那你們有沒有做什麼具體的事情讓她們儘快離開這個行業呢？也沒有，只是讓警察來抓她們。我說我會堅持鼓勵人繼續賣淫，我信教，也是個基督徒，不過從今天起，我就選擇下地獄，你們上天堂吧！我選擇不要和她們碰在一起，她們也覺得不要跟你這種人來往。但是我也知道後來她們開學習班的時候，我的大頭照都會被拿出來放在教材裡，說這個人就是在香港鼓勵人家賣淫的魔頭。我覺得也很好，很多人都認得我，都知道嚴月蓮就是做賣淫的。

坦白講，我也是在非常偶然的狀況下碰到個案而進入這一行的。我有一個朋友，她先生因工殤死亡，但是因為沒法證明是因公死亡，無法得到賠償。她有一天跟我說，她在兼職，我就問她在做什麼兼職，她說就是在做這個，我就追問這個是什麼，她就說是「一樓一鳳」的情況下兼職¹，孩子下學她就回家。我第一個反應就是，你為什麼要做這個？你很缺錢嗎？我借你

1 編按：本文所謂「一樓一鳳」、「一樓一」、「姐姐仔」、「姐仔」、「哥哥仔」、「小姐」，指的都是「性工作者」。在本文中只有第一次出現時用引號標明，此後就不再另行標示。

吧！或者我們去政府申請綜援吧！她就很低調的跟我說，除了錢，她身體也有這個需要。我腦袋很笨，就聽不懂有什麼需要，然後一直追問，後來她解釋了半天，我才懂了，我很快就說，那你就趕快找個人結婚吧！你看！這就是我當時的無知想法，以為身體有需要，就要結婚解決。事實上，台北公娼抗爭的時候，我也在華西街！正在努力救這些小孩脫離苦海！可是現在大概我也墮落了，我就覺得做「小姐」也是很好。

我想我就是這樣在很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這樣的一個「老師」，她讓我知道，做這個行業是很有自由空間的。我有一次跟著朋友去看這位我叫她做「老師」的人，我就問她，你為什麼要做這個？她就非常兇的問我，你一個月賺多少？我跟她說了，她就跟我說，我一個禮拜賺的錢是你一個月的工資，為什麼不好？我想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知道了這個行業是這樣，但是不算瞭解很多。

剛好那個時候我參加了一個天主教的團體，他們會去給站街的「姐姐」發傳單做宣教，我就決定去當義工。可能因為我是勞工出身的關係，我很快就發現這個方式有問題，因為他們預先就認為站街是不對的，所以如果看到姐姐正在拉客，就會去告。二十年前的香港，站街還是有警察要定期的明天抓你，後天抓你，用這種方法去「報數」，因為警察都有一定的額度，一定要滿足。剛好我認識一個「姐姐」有一次月經來，沒上班，她就領了小孩去上學，回來的時候警察的車就在等她，要她上車。她抗議說上個禮拜才付過這個月的錢，而且今天真的不是上

班，但是警察說，不要跟我說，就要她上車。這個時期所有站街的被起訴，一般就是罰款就可以離開，不會坐牢，但是法律本身是有規定可以坐牢的，最高可以坐半年的牢。我想就是湊巧吧，假如不是她，我也不會開始做賣淫的工作，因為她來找我，跟我說她會被起訴，她很生氣，為什麼上個禮拜才付過錢，這個禮拜又來？那時我還在做勞工的組織，我就跟她說，可以找律師看看，那時候我只懂勞動法，不懂刑法，而在香港，跟賣淫和姐姐有關的法律都是刑法，我得去另外找律師幫她。在找的過程中，我才知道，原來做這個工作一點都不好，律師大部分都是勞動法的，對於賣淫的案子，他們不是說不知道，就是說不要碰。我們就只好跟著這個姐姐到處跑，不知道怎麼辦，最後這個姐姐就被判坐了兩個禮拜的牢，我們就處理她的小孩，幫她照顧接送小孩上學。

這時候開始，我就想，我小的時候，假如你是擺地攤的，那個時候香港每天都會有現在大陸說的「城管」來收錢，每天都來收。二十年後，我還以為我長大了，香港已經是個很國際化的城市，應該很文明了吧。而且我一直做勞工的組織工作，我認為有什麼不對就可以根據勞動法去法院告，去爭取就好了，很簡單嘛。這次過後，我才知道，香港一點都不進步，一點都不文明，非常落後。甚至法官在法院裡赤裸裸的對著很多人說，因為你是小姐，所以我不會相信你講的話，就算警察的口供有可疑，我也不會相信姐姐。

就是因為這樣，我就開始進入做賣淫的組織工作。有些學者，有些團體會問，你支持「小

姐」，不覺得這樣是把女性的身體商品化嗎？我就問她們，什麼叫商品化？簡單一點解釋吧！她們就說，身體這個東西怎麼可以賣呢？那我就想，我在工廠裡面，整天坐在那裡做這做那，也是賣啊？有什麼不一樣呢？她們也很客氣，大概就覺得跟你這種人怎麼講都講不通，就懶得搭理我，就算了。

經過了十多年的默默耕耘，性工作者權益運動總算取得了一些進展。透過不斷的社區活動、在學校及團體之間的教育、以及利用不同媒體為性工作者平反，「姐仔」的聲音走進社會，公眾亦有機會認識到性工作。而對於姐仔而言，透過一連串的參與，她們對工作的認同感增加了，對自己的權利意識亦有所提升，這亦是我們一直希望見到的。

你可能会懷疑：目前性工作者仍是「見光死」，更遑論得到什麼保障吧。那麼，紫藤的工伴豈不是起不到什麼作用？其實不然。性工作者運動無論對外（面向社會和其他團體）和對內（與性工作者的交流和組織），十多年來，都取得了不少進展。我接下來提供一些例子。

法律及政策方面

姐姐仔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警察濫權及法律的打壓。

香港有一套自相矛盾的法律：既沒有定罪性工作為非法，但又嚴禁「賣淫場所」、「唆使他人作不道德行為」及「依靠妓女為生」，這些法律都影響到性工作者的謀生。這種自相矛盾

也同時製造了更多機會讓執法者和違法人士欺壓性工作者。一直以來，姐姐仔時常要面對警察的無理打壓，被誣告、被毆打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令性工作者面對打劫和暴力時不敢向執法部門求助。警察還利用職權，以「有限度的身體接觸」為藉口，在「放蛇」（誘捕）時要求手淫、口交和性交的服務。面對這些情況，姐姐往往只能啞忍，投訴無門。因為警察仗恃著社會對性工作者的偏見，及性工作者對自身權利的不夠認識，肆意侮辱她們，甚至插贓嫁禍，以安全套作為證據，濫捕性工作者。

我們起碼有十年的時間一直在處理警察免費嫖姐姐仔的這個問題。我們剛入行去外展的時候，姐姐們就告訴我們，警察會用一把槍，壓著一張港幣五十元，意思就是說我只付你五十港幣，你不能反對，嫖完還會跟你說你，不要再待在這裡，明天我會來抓你喔。我們那時還傻呼呼的，我們就分發法律的小冊子，讓姐姐們知道自己的權利是什麼；但是警察也挨家挨戶的警告姐姐們說，要是你們敢跟紫藤這兩個三八女人在一起的話，我就每天都站在妳門口。這時候姐姐們就什麼都不太敢接待我們。但是警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來免費嫖，我們也就一件一件的不斷跟他們周旋打官司，到現在，警察已經願意每三個月跟全香港「一樓一」的姐姐們坐下來談，想當然爾都是作秀，我當然是不滿意，但至少姐姐們覺得要是出了事情，可以拿出來解決。

現在我們已經經歷了三個關卡。第一就是以前客人要是免費嫖，警察是絕對不管的，警察

會笑你說，你剛入行嗎？怎麼會讓人免費嫖？他絕不管。但是現在就一定管，只要打電話報案，警察就一定得來，要立案，甚至警察會叫姐姐打電話給我們，警察說他們不懂怎麼處理個案，那我們就會去教他們，要用什麼法去起訴客人。第二就是警察不會再去免費嫖一樓一的姐姐，但是這絕對不是紫藤的功勞，而是因為環境的改變和行業本身的轉變，創造了新的工作形態、新的「工種」出來，警察更方便去拿好處。第三個關卡是我們非常生氣的一個個案，但是我們怎麼都打不過。我們有三個姐姐因為在門口掛了這個東西而被判了一年，還罰款五千，這個卡片上的文字就是說歡迎的意思，下面就是

一些好聽的話，希望「姐姐」財源滾滾等等。這是因為有些姐姐生意很好，有時候裡面還在做，有別的客人來，那她必須要讓客人知道他們得等一下，稍候，所以我們就印了這種東西給姐姐們貼在門口，結果她們就被抓了，說是賣淫的標誌。打官司的時候，第一審就輸了，但是我們沒有錢，沒辦法繼續打，所以我們就去大學裡面找一些我們的朋友教授，請他們一定要把這個卡片貼在門口



(圖片來源／嚴月蓮)

，下次再有人來抓姐姐，我們就請他們去抓這些大學教授。有些官司我們就是打不過，大家講法律，我想講的是，法律真的不講道理，這個張貼的東西算什麼呢？什麼都不是，但是姐姐仔還是會被抓被罰。

此刻我還想報告大家，紫藤今年年底會正式關門！

我想我們成立的時候就很清楚，我們只是歷史性的存在，有時間性的，我們最終目的是希望不同的工種都有自己的團體。為什麼這樣想？可能跟我過去做勞工的經驗有關。大家好像永遠都是本位主義，就是我們的屁股決定了我們的腦袋，所以如果我是做生產線的工人，好像就一定會跟領班過不去之類的。我們在做賣淫的過程裡面也看到很多和一樓一不一樣的運作場所，例如卡拉OK、夜總會、桑拿、站街，還有最大的一批就是〈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回歸的事實放在眼前的時候，中國大陸就來了很多女性，她們很不容易，透過結婚或別的方式留在香港，也有很多外勞進來。因為競爭的關係，一樓一的姐姐們開始跟這些新來的人吵架，警察就退到第二線，說這麼多外勞都是非法的，所以政策上嚴打賣淫是對的。連一樓一的姐姐都覺得外來者不對，說她們來這裡工作，把價格壓低了，所以就報警抓。有好長一段時間，紫藤每天收到電話，不是被外人罵，而是一樓一的姐姐們天天打電話來罵，說紫藤在幹什麼？你不是我們的團體嗎？你為什麼也支持外勞，幫外勞？你應該去報警把她們抓了！打電話的這個人，連廣東話都說不好，那就表示她不過早來香港兩三年而已，不過她比較幸運，有一個臨時身分證。



二〇〇四年五月一日五一遊行

(圖片來源／何春蕤)

我們就看到這種血淋淋的事情。那時候，我就跟同事說，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我們要分家，不同的勞動者不能在同一把傘下面。剛才我說一樓一會定期和警察開會，有一次我偶然回辦公室，就看到她們在和警察開會，她們看到我就說，哎，我們希望你來幫忙我們抓這些外勞

！我聽到就快暈了。警察當然很高興，就對她們說，你們就定期給我們這些外勞的地址和詳細的情況啊，一樓一的姐姐們就很高興，就說好啊好啊，我明天就給你。可是我們又不能說你不能給，因為那是她的自由，我們只能說，姐姐們忘了自己都曾經去其他國家做過外勞。紫藤成立五年後就出版了一本《出發前緊記：跨境性工作者手冊》，這是為誰出版的？就是為我們香港本地的姐姐出的，當時姐姐們覺得香港生意不好，賺得不多，所以就跑去日本，去澳大利亞，我們就出版這本書，提醒她們要注意的事情。可是，人很快就忘記了，她們忘了她們自己就曾經是外勞。

我們決定要分開，獨立運作，因為現在香港的人口結構改變，產業結構也開始改變，〈中英聯合聲明



(圖片來源／紫藤會訊—第二十二期)

之後，中國大陸開放，香港所有的工廠都往深圳移，就留下一大批像我這種年齡的失業婦女，什麼工作都沒辦法做，連賣個餅乾都指定要三十歲以下的才能做。我們經常就在開玩笑，難道三十一歲的人拿個餅給你吃，你就吃不下嗎？不會啊，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嚴格？這個時候我們就開始和香港政府鬧，說政府應該善待一直在創造香港早期經濟的一些女工。我記得我十二歲在工廠做，這一點都不特別，當時香港每家人都很窮，像我這樣能讀完小學，進工廠，已經不錯了，我認識很多工友，九歲就已經開始工作。可是我們工作了這麼多年，到了這個時

候，一九八〇年的時候，我們什麼都沒有，沒有退休金，什麼也沒有。香港政府就想怎麼拖，就開始著手辦理培訓中心，就是培訓你做保安，拿個棒子巡來巡去那種，或者培訓你做保母陪月（陪坐月子）。

最新的發展，大概十年或者五、六年的光景，就是培訓你腳底按摩。可是政府開那麼

多班，又忘了一個重要的事情：每天差不多有三百多個婦女從這些班畢業，但哪有這麼多按摩店可以上班？老師就叫婦女自己組合開店吧，而同學們也乖乖照辦。如果你現在去香港，你就會看到很多黃色的招牌，過去黃色的招牌都是賣淫的，但現在不是了，現在就是一對小腳，就是腳底按摩。做按摩的有沒有賣淫呢？其實她們也不是想賣的，但是實在太多同行，競爭太多，一個小時按腳，按得手指都痛了才二十元，但反過來說，幫你打個飛機一百元，誰不幹？我幹！所以就從腳底摸著摸著就摸上去了，就是這樣。好，現在一樓一把關很嚴格，警察沒地方免費嫖了，那他們就跑到腳底按摩去，死要問姐姐有沒有性服務，姐姐否認，說只有腳底按摩，警察死不相信，說一定有。有些姐姐頂不住，會做，但是一做下去，警察就抓到了。我們有兩個非常典型的個案，連法官都看不下去了，因為有些警察會「放蛇」，故意嫖了九次，第十次才抓你。我們曾經請個別的議員和立法局，要他們開一個特別的審查會議，討論警察放蛇的相關規矩，最後出來的就是警察祭出上方寶劍，說內部文件連議員都不能看，最後也就不了之。你只好繼續跟他們打仗。

香港法律有些規定很荒謬的。一樓一不違法，但是租房子給你的人違法，這樣就等於你也是違法了。還有，按摩的時候按摩腳底沒問題，但是異性按摩，只能頭到頸，腳底到膝蓋，身體中間這段，怎麼都不行碰，異性也是不能碰的，一碰就完蛋。這些法律非常奇怪，在深圳，全身怎麼摸都可以，可是一過了關卡，就不行了。現在腳底按摩是一個新的性行業，行業裡的

人口也很不一樣，很大部分都是國內來的，她們會把國內的一套東西帶來香港，就認為「我跟這個警察很熟，他就不會抓我」。我們跟她們說，警察的話，打死都不能相信，可是她們還是聽不進去。

有一個例子很經典，我們去大學講課的時候都會帶這個姐姐去講課，這個例子就是「法律逼良為娼」。這位姐姐一直只做腳底按摩，連飛機都不打的，但是她被警察放蛇。警察進去問她，有沒有打飛機，她就說沒有，我只是按摩，被按摩或許還可以。那這個警察就自己打飛機，打完了，他的同事進來，就說她賣淫，因為她幫警察打飛機，有什麼證據？沒有。姐姐說我沒有幫他打，那個警察的同事就說有，這個姐姐最後就判了三個月，緩刑兩年，但是罰了一萬兩千塊。她出來以後非常憤怒，大哭了好幾場，第二天就來找我們，說，我決定做壞人了。我們說，做什麼壞人？你要去打那個警察嗎？她說，不是，我預備租一個房子，就下海賣淫，就做一樓一，我以前不想做的，現在要做了。不過，我看她現在也賣得很開心，覺得這個工作不錯啊，早知道就不用被人告，就做一樓一就好了。這就是法律逼良為娼。

是因為行業裡興起了改變，所以紫藤現在也開始組織腳底按摩，讓她們知道現有的按摩條例是怎樣的，希望未來能改變這個法律。這比登天還難，香港不是沒有按摩，而是要一大筆錢，要大財團才有資本可以開大的按摩院，你個人開業不可能。不過反正有這個行業，個案也一直出來，我們總是有工作可以做的。

面對種種不公平的情況，首先要做的是讓姐姐仔認識法例和自己的權利，意識到問題是源於執法制度的不公平。可幸的是，在過程中，一些清楚現況的姐姐仔對打壓她們的法制也開始感到不滿，願意一同行動，站出來爭取自己的權益，而我們亦見到越來越多姐姐仔挺身維護自己的權益，願意去打官司、投訴警察。

可惜，姐姐仔的投訴往往不得善終。有些姐仔在投訴後因身分曝光，遭到警察的報復、騷擾，令她們終日提心吊膽，難以繼續工作。當中二〇〇五年李婉儀事件便是一個慘痛的例子，她被警務人員冤枉、誣告、毆打、毀滅證據，而負責放蛇的警察更曾接受口交服務，她不甘被屈而自殺身亡。她被誣告受辱而死已有六年，她的家人從不間斷地為她投訴，向社會大眾公開事件，揭露警察濫權的問題，可是至今仍未收到警察投訴科的調查報告。又例如一些外勞姐仔也時常被警察迫害，警察往往利用她們不懂法律，在沒有足夠證據下便無理拘捕她們，軟硬兼施地迫她們簽紙認罪。若她們拒絕簽認罪，便把她們拘留最少三個月，直至開始審訊，然而審訊過程倉促，平均三分鐘完成審訊，又不容許姐仔答辯，姐仔根本沒有公平的法律對待。在重重關卡、又不想等候審訊期間坐牢的情況下，外勞姐仔都放棄審訊，受屈認罪。

其實法律的原意是用作保障性工作者，讓她們免受欺壓。然而現時的法律往往被用作打壓性工作者，使她們失去生存空間。例如在二〇〇七年，警察積極打壓網站和大樓業主，美其名是打擊操控性工作者集團，但被捕者大部分都是性工作者、無牌按摩，或者是兩個姐妹一起工

作的姐姐仔。由此可見，警方的目的，其實是令性工作者無法經營，也就是根本就濫用法律去打壓性工作者。

為針對各種無理打壓性工作者的法律，我們舉辦法律研討會，商討修改現行的法律，改變性工作者的不利地位。例如在二〇〇三年舉辦「讓我坦蕩蕩：法律研討會」，二〇〇六年我們舉辦了「千言萬語：性工作與法律」會議，邀請海外性工作運動分子、工會研究人員、法律學者，一起來解釋他們國家所行的法律，透過認識其他國家的不同法律模式和經驗，為本地的公眾和法律制定人士帶來新思維，讓他們制定更理想的性工作政策及法律。

爭取性工作非刑事化，是我們一直所堅持的。只有消除一切打壓性工作者的刑事條例，取消不完整、偽善的刑事條例，使不同方式經營的性工作者都能獲得法例保障，才能有效保障性工作者，讓性工作成為一個普通行業。

公眾教育方面

一直以來，社會對「姐姐仔」的描述總離不開貪慕虛榮、吸毒、被黑社會操控、破壞別人家庭和不道德等。即使是一些女性主義者，都認為性工作會助長男性對女性的剝削，姐姐仔不應靠性工作為生，應該自主。然而，長期以來，媒體的負面報導和描述，令社會大眾對姐姐仔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抗拒和排斥，事實上，性工作者享有很高自主性，女性藉此體驗身體自主，

突破性別的枷鎖，使她們能按勞得值，用身體去賺取金錢，自食其力。真正剝削她們的，是歧視和不公平的法律，令姐姐仔成為社會上最邊緣的一群。因此，我們一直不遺餘力地把姐姐仔的聲音帶到社會裡，展示她們的面貌，讓姐姐仔能夠發聲，透過社會與姐姐仔的互相接觸，改變大眾對姐姐仔的固有想法。

為了這個信念，紫藤在成立後不斷做好公眾教育的工作，透過各種類型的活動，把我們的想法傳到公眾裡去。其中義工訓練是我們最初經常舉辦的活動。我們相信透過不同人士與姐姐仔的接觸，可以改變大家對姐姐仔的想法。我們向義工強調義工訓練的目的，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是來拯救姐姐仔的，更不能抱著「參觀動物國」的心態去偷窺姐姐仔。此外，我們會讓義工們參與一系列的外展活動，透過事後的討論，讓他們有不斷反思的機會。

然而，最初在籌辦各種形式的公眾教育活動時困難重重。首先，社會對性工作的看法十分負面，連基本的討論空間也沒有，更遑論進行公眾教育！因此，我們利用各種方法去爭取舉辦活動的機會，其中一個最常用的途徑是到大學舉行講座，透過姐姐仔和學生的親身對話去改變大家對姐姐仔的印象。但當中最大的難題是姐姐仔的親身參與，因為大多數的性工作者都不願意曝光，害怕會碰到家人和朋友，會令自己和家人受壓，所以要說服她們參與，實在有一定的困難。即使有姐姐仔願意出席講座，部分學生們的尖銳提問和不尊重的態度也很難過，例如：「你為什麼要做『雞』？」、「你知道什麼是尊嚴嗎？」這些充滿侮辱及傷害的問題往往會令一些姐姐

仔不願再參與講座。幸好當中亦有些姐仔不怕面對批評，願意堅持到最後，透過進行大學講座為自己發聲，現時，每學期，不同學院、不同學系都會安排我們和姐仔到大學講課，而近年，學生們對姐仔的態度亦漸趨正面，在面對姐仔時，大部分的學生都會懂得肯定和尊重姐仔，這對姐仔來說，無疑是一種莫大的鼓勵。而部分熱心的學生更會主動接觸我們，參與義工和各項活動，為性工作者的權益爭取出一分力。

我們深信，義工訓練是要代代相傳的。經過多年的義工訓練，一些多年前參與訓練的義工學生，現在已經在社會上擔當各種職位，有的成為了教師、社工等，在不同層面為性工作的權益爭取出一分力。近年，我們不斷擴大義工的層面，向不同的團體如婦女、勞工、青少年團體等招募義工，擴大我們的義工網絡。

除了應邀到各大專院校進行講座外，我們還會透過不同形式去消除大家對姐仔的負面看法；例如舉辦首屆性工作者電影節，透過放映電影和短片，嘗試打破主流電影對性工作者的刻板形象；出版書籍刊物如《性是牛油和麵包》、《亞洲性坊間》、《雙程心事：十二位中國性工作者記述》等，赤裸裸地向公眾展現姐仔的生活，讓大眾明白到性工作者面對的處境和問題，姐仔的工作和你我的無異，同樣是一份工作，都是要付出勞力，才得到金錢，性工作者理應受到社會的尊重。

近年來，公眾教育已漸見成果，當中最大的轉變是在語言用詞上，大眾明顯已較以前客氣

，由以往的「北姑」、「雞」、「妓女」，到現在部分社會媒體和社會人士已經開始使用「性工作者」這個較尊重和接納的名稱。這個轉變不單是紫藤的努力成果，亦有賴各團體和熱心人士多年來的支持。

政治方面

我想紫藤之所以會被大家辨識認為是鼓勵賣淫的團體，那要感謝一九九七年以後香港開始有了選舉、政黨、團體，因為一到選舉的時候，一些特別的地區，這些人平常什麼都不做，到了選舉的時候就會出來作秀，說我們這區太多站街的女孩子，影響良家婦女，也影響我們這些男的，非常不好，所以每次選舉的時候都會嚴打賣淫。有個朋友鼓勵我們直接和那些候選人面對面打仗，我就覺得非常苦惱，第一，我們沒錢，第二，我們沒能力寫文章和人家辯論，可是我和同事商量，一直這樣挨打也不行，就背水一戰吧。我們就籌錢買了半版的報紙廣告，譴責這些候選人為了個人利益犧牲這麼多姐姐的生計。當時我們寫稿的時候是朋友寫的，去找人連署把名字加進來支持我們，我一直擔心，死了，最後可能只有兩個名字，一個是我，一個是我朋友。我們發出邀請三天，報紙出來的時候半版都滿了，這才是真正戰爭的開始。這時候對方也開始組織遊行，就在地區裡面遊行，說小姐站在這裡不行，開始在報紙上也有一些學者和女性主義的團體寫文章罵我們，我就覺得更慘，我不會寫文章。可是這個時候非常幸運，認識了

何春蕤老師，就打越洋電話說明我們的處境和需求，她很幫忙，今天打了電話，明天稿子就到了，真的就到了，我們就非常感謝。我們這場仗就是這樣打過去的，社會也開始知道有這麼一群人跟姐姐在一起，和她們打交道。

性工作在以往得不到政客的支持，更甚者，一些政黨團體會利用「掃黃」去爭取市民的支持，以爭取選票。為了停止這些對性工作者的壓迫，紫藤曾於二〇〇〇年發表「立法會選舉婦女政綱」，要求議員保障基層婦女權益，支持性工作非刑事化；其後，我們更發表了「抗議政客迫害性工作者聯署聲明」抗議一些政黨團體以打擊性工作者為藉口去爭取選票；又與民間團體合辦不同活動，例如在「國際人權日」當天頒「偽人權獎」給政黨，諷刺那些無理打壓姐仔的政黨。

在多年來，我們不斷游說議員，希望他們正視性工作者的問題。但在最初，大部分議員都只表示他們可以「閉門」支持性工作者，但卻不能公開表示支持。經過多年的努力，現在已有數位議員願意公開關注及支持性工作者，雖然仍屬少數，但我們相信將來會有更多政客、議員願意改變對性工作者的歧視偏見，為性工作者的權益爭取出一分力。

為了讓國際社會關注本港性工作者所面對的人權問題，我們定期發表提交有關姐仔情況的報告，例如提交影子報告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委員會，希望以國際壓力促使香港政府正視性工作者被剝削人權的情況；特別是警察濫用職權打壓性工作者。

這一系列的行動引起了社會對性工作者的討論和關注：譬如一部分政客已開始關注警察對性工作者濫權的問題；性工作者被迫害更令性工作者問題成為香港十大人權個案之一，這些無疑已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轉變，但大部分政客對性工作者仍是不接納，甚至仍然以打擊姐仔來賺取政治籌碼，而姐仔被剝削基本權利亦屢見不鮮，故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絕不會鬆懈下來。

社會運動方面

過去十多年，政府不斷分化社會，使邊緣群體互相仇視、歧視。例如在社會資源不足的情況下，一些低收入人士就會歧視申請綜援的人，批評「綜援養懶人」，但是同時，綜援人士也會埋怨內地的新移民分薄了社會的資源。在大家怨聲載道的情況下，我們更需要增加諒解、互相支持和團結去抗衡政府的分化。

社運的發展中，性工作者的權益爭取也嘗試著走進社運圈，成為當中的一分子。我們一直認為性工作就是工作，性工作者亦是勞工一分子，因此，我們積極



嚴月蓮（中）帶領性工作者參與二〇〇四年五月一日香港的五一遊行

（圖片來源／何春蕤）

前，我在一個工會裡做，當時就有一個桑拿按摩店欠工資，那時候就是我在處理這個個案，處理過程裡面就幫她們成立一個工會，這個小工會就掛靠在一个大的工會裡面。最後這個小工會是死掉了，原因就是因為掛在大工會裡，其他一些大的工會並不尊重這個小工會。我舉一個明顯



二〇〇四年四月香港紫藤舉辦國際工作坊，嚴月蓮（中）與各國性工作團體交流（圖片來源／何春蕸）

參與各項爭取勞工權益和公民權益的行動：二〇〇五年的世貿抗爭行動、每年的「三·八婦女節」活動、「五·一遊行」、「七·一大遊行」等。除此以外，紫藤也支持其他團體的遊行爭取，例如支持本地婦女團體的「反對暴力對待婦女」；支援參與同志團體舉辦的「國際不再恐同日」等，「回歸十年」民間團體的聚會等等，這些都是難得的機會，可以讓「姐姐仔」與不同社運團體的成員接觸、互相了解，藉著與其他團體的交流連結，彼此支持、提高姐仔的公民意識，也提升其他團體對性工作的認識。

在爭取性工作者權益的路途上，早期真的很困難。紫藤成立的過程裡，以前一起做工人運動的工會和朋友们，一直覺得我做這個很不好。在還沒做賣淫以

的例子，每年工會組織都會舉辦一個大的開心 party，所有的工會都來參加，我也去了，在 party 裡面，其他工會的理事就說，今天晚上大獎就是桑拿工會的這些女的幫你按摩。說這句話的時候，那個口氣是很猥瑣的，好像就是說「你們就可以享受到啦」。我就看按摩工會代表的臉色，她們就很不高興，因為其他這些工會的人只能看到按摩就是做這個的，而看不見她們也是工人，也是勞動者。

所以說，紫藤十六年的經驗教了我一件事情，我再也不會簡單的說，這是好人，這是壞人，這是對，這是錯。要看你坐在哪個位子。討論工人運動的時候好像大家都沒問題，但是在工人運動裡說「姐姐都是工人」，就算多年的朋友都會說「不一定」。

由以往性工作者的權利得不到任何重視，到現在已經開始引起關注，一些戰友包括同志團體、較開放的宗教團體、婦女團體等，更不惜反主流，在不同崗位給我們支持。雖然主流社運團體之間仍不大接納姐仔，但憑著各方友好的點滴支持，才可令性工作者成為社運的一份子。

文化運動方面

除了積極的權益爭取外，軟性的文化活動對喚起大家對性工作的關注亦十分重要。近年，紫藤應一些電台節目的邀請，向公眾介紹性工作和本港性工業的情況，讓公眾了解性工作或行業內的獨有文化。與女同盟會合辦的網上電台節目，更為姐仔、客人、馬伕等提供了與大眾

交流的平台。

二〇〇三年，我們舉辦「我的生活：性工作者攝影展」，由「姐仔」自己透過相片向公眾呈現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讓「姐姐仔」能向公眾表達自己，與社會人士直接對話。這個活動最初只是一個姐姐仔的內部活動，後來，影展的作品在不同的地方展出，當中包括一些「上等」的地方，例如文化中心、藝術中心等，讓大家明白姐姐仔的作品也能登「大雅之堂」。在影展中，不少姐姐仔也透過作品寫出了自己的心聲：與他人一樣，在她們的生活當中，同樣有期望、有掙扎、有家人、有自己所想所做、有興趣；而性工作只是她們生活的一部分。她們的分享引起了社會大眾的不少迴響，讓更多人了解到性工作是工作，性工作者其實和我們一樣都是人，理應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尊重。

除了電影節外，我們亦有利用不同的媒介例如電台節目、話劇、甚至是印製T恤、海報、宣傳卡等等去講述姐仔的故事和表達我們的訴求，令更多人聽到姐仔的聲音。

可惜的是，在推動文化活動之際，我們往往受到政府部門的打壓和阻撓。例如舉行攝影展時，文化中心要求我們在展品上貼上「家長指引」的告示，然而，我們的展品並沒有任何裸露成分，場內有其他展品含裸露成分，卻無需要有「家長指引」，為何大家在面對以性工作為題材的展品時，會帶有雙重標準呢？由此可見，大家對性工作本身存在偏見。又例如在第一屆香港性工作者電影節中，我們遭到食品環境處為難，企圖以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來阻延電影節

進行。一直以來，不同的團體亦有舉辦類似電影播放活動（包括青年中心、婦女團體及社區團體等），何以執法部門從未對這些團體執法，但卻針對紫藤舉行是次電影節選擇性執法，打壓邊緣群體的活動？然而，我們相信越是被打擊，就越需要在當中創造生存空間。

事實上，文化是由我們的生活所衍生出來，以藝術文化活動作為橋樑，我們便能進一步把性工作和市民的日常生活連繫起來，讓大眾能以多角度認識性工作和性工作者。而這一連串的活動亦會帶動主流社會想法的轉變，例如近年有不少藝術工作者選擇以正面和人性化的角度製作有關性工作／性工作者的電影和書籍，令市民能有更多新角度認識性工作／性工作者。有見及此，縱使我們推動文化活動時常遭受阻撓，但我們仍會努力堅持。

十六年性工業轉變

在過去十多年內，香港性工作者的人數不斷上升。在一九九七年，從事性工作的女士人數大約是一萬兩千人（Lehbridge, 1997），但到了二〇〇一年，已經上升至二十萬人（Zieng, 2006）。其中包括「企街」（在街頭工作）、一樓一（在單位內獨自工作）、跑鐘（電召）、卡拉OK、夜總會、指壓中心、按摩院及桑拿浴場等。

性工作者當中很多是新移民婦女，而性工作者人數上升有三個原因：

第一，香港的經濟轉型，導致大量人口失業，一些早年從事製造業及零售業的婦女在失業

後難以轉型，為了維持家計，便投身性行業。

第二，自香港和澳門回歸中國後，與內地的交往日益頻繁，內地人到香港工作的機會亦相對增加；加上二〇〇三年後實行了中港自由行的旅遊制度，短暫來港數天、又或是前往東南亞前後到港短暫停留數天的人數亦大增。一些內地新來港的婦女學歷不高又缺乏謀生技能，加上居港又未滿七年，不能申領綜援，只有用自己的身體去賺錢養家，令投入性工作的人數不斷增加。

第三，隨着社會發展，性行業近年來亦不斷出現新服務類型：例如以往性服務只集中在夜總會、卡拉OK、桑拿浴場等，但是現在還有網站、援交、私鐘等新服務，五花八門的新服務令性工業朝向更多元化、多樣化的發展。

在二〇〇五年，有鑑於男性性工作者在香港亦日漸增多，所以紫藤也撥出資金，開設關注男性性工作者社群的項目，藉此建立持續關注男性性工作者權益的力量。

要讓性工作者有勇氣站出來面向公眾，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對現行政策的不滿，實在是困難重重。除了要面對警察和部分政治團體的打壓外，最令她們洩氣的，是社會大眾對她們的歧視目光，各種道德批判和政策打壓在十年間並未遏止，致使性工作者的生存空間更形狹窄。

性的行業在香港真的沒有很多的出路，國內反而比較好。我們最近在深圳開一個服務中心，出去外展的時候，那些老闆們還跟我們工作人員說，你們來兼任兩個小時好了，兩小時、三

小時都可以。還有，入行的組合也很多元化，很開心，有兒子帶爸爸來做，爸爸六十多歲了，所以我們這些下崗的工人還是有市場的。還有母女的、姐妹的、姑嫂的、夫妻的，都一起來做。我認為如果賣淫要有前途的話，可能還是在中國，因為太普遍了，大家以為賣淫都是祕密的，都不要讓人知道，但是在深圳不是這樣。兒子在賣，媽媽還要兒子會賺也要會花，這個媽媽真的很厲害，這跟香港很不一樣，香港還是在要求，你要規規矩矩，要怎麼樣怎麼樣。

假如你說性工作者在香港被歧視或怎麼樣很嚴重，我可能比較後知後覺吧，我覺得會有人對你有點不客氣，但是這幾年真的好了一點點。可是我有一個同事從她個人的生活裡就看到壓力。這個很好的同事不得不放下這個工作，因為她媽媽一直罵她，我們都住在公屋，她有一次搭電梯回家，只要當天上過電視，就被鄰居遇到指指點點問她是不是電視上那個人。她媽媽是在市場賣菜，每天被人問說是不是生意不好，錢賺不夠，為什麼女兒要去做這個？我這個同事真的熬不住，不是個人熬不住，而是家裡熬不住，所以她要離開。我自己感受不到賣淫的壓力，但是我感受到靠小姐維生的人的壓力。所以紫藤的工作人員通常不會留下來做很久，這是非常不愉快的工作經驗，因為工資不高，也沒前途。有個同事做了十年，最後要養家，也離開了，這不是說我們工作沒收穫，收穫很大，至少我個人從來沒想過性是這麼好玩的，原來天空是這麼寬的，我腦袋裡以為一男一女插入就是性，後來在圈子裡打滾才知道是很多樣的，是很好玩的，讓我開了眼界，這是我過去做勞工組織的時候沒想過的收穫。聽說最近市場的口味是比

較喜歡老年人，所以我們還有機會組織這些人。

從紫藤的出版品就可以看到我們一步一步的工作，我們第一本書《性是牛油和麵包》，就是介紹香港的性工作，我們也和黑社會打交道，我必須說，香港的馬伕和黑社會真的不像電影裡描寫的那樣，他們非常的斯文，有時我覺得我自己都比他們粗魯，所以江湖上有人說我們紫藤是黑社會。第二本書我們就出了一本介紹外來的性工作者，就是中國大陸來香港的，《雙程心事：十二位中國性工作者記述》。後來我們繼續墮落，組織了客人，也出了一本有關客人的書，叫做《好客之道》，也研究幾個國家有關性工作的法律，其他也出版了零碎的調查研究。

性工作者的自我提升

除了對外的的工作，讓大眾實際知道性工作者的想法，並鼓勵她們自身參與，才是最重要的。因此這十多年來，我們從未間斷對內培訓及組織性工作者。

回望這十六年，由最初透過外展和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職業訓練班、聯誼康樂活動、親子活動等，讓姐仔彼此認識，逐漸建立自己的網絡。慢慢地，姐仔開始勇於作自身參與，例如投稿到報章刊物和學生報等，使自己的故事、聲音傳到公眾。另外，也和不同團體作交流，如女工、被虐婦女、同志團體、宗教團體、人權組織、以至專業人士如社工等，透過與不同背景的社會人士合作，加深彼此的了解和尊重。而在國際社會中，香港姐仔的聲音也開始

響亮，她們在國際妓權會議中發聲之餘，亦會出席一些國際性的論壇和會議，例如愛滋會議，社會論壇等，向國際社會講解本港性工作者的情況和關注議題，並學習不同國家的文化和對性工作者爭取權益的經驗，回來後再作分享和分析。

經歷以上種種，她們對自己權益的意識開始日漸提升，會走到街上反對所有對性工作者的暴力，亦會有自信地和立法會議員講述自己遇到的處境和困難。姐姐仔自身的參與才是最引起社會關注和打動人心的原素。

組織姐姐仔的過程也是困難重重的。由於工作人員對「姐姐仔」的情況未能全然掌握，再加上經驗不足，以致初期頻頻碰壁。加上性工作者的工作環境和工時長所限，影響到她們的參與，多年來，不少姐姐仔只能斷斷續續地支持我們的工作，幸好一些核心成員仍然堅持參與，為自己和其他姐仔出力，維護及爭取自己的權益。這一切成果，都多得姐姐仔們的體諒，以及她們不輕言放棄的恆心。

十六年來，姐姐仔由「見光死」到有人能夠站出來去為自己爭取權益，這個轉變引證著性工作運動開始漸見曙光。二〇〇七年，真正屬於性工作者的「姐姐仔會」正式成立，姐姐仔進一步為自己當家做主，組織自己，期望能藉著討論與性行業息息相關的政策和法例，策劃相關行動為業界爭取權益，為同業提供適當支援。我們相信隨著姐姐仔會的成立，能連結到更多的姐姐仔，一同謀取性工作者的福祉。

另外，紫藤也把關注點擴大到大陸。在中國國內，性工作者是犯法的，所以國內性工作者的生存處境更為艱難，她們要面對公安或黑社會的勒索、政府此起彼落的的大型掃黃行動、拐賣、搶劫等等的問題，所以在過去的十多年間，紫藤亦與國內的大學、婦女組織等如北京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等合作，分別在北京、天津、山東、雲南等地開展女性性工作者項目，改善性工作者的職業安全狀況、培養國內的項目人才。

未來面對的困難

默默耕耘了十六年，紫藤的爭取漸見成果。然而，相較於姐姐仔而言，紫藤所面對的困難實在是微不足道，姐姐仔仍被打壓，面對被打壓情況也還沒有顯著的改善。

首先是警察濫權的情況多年來仍未有改善，而所改變的，只是他們打壓姐姐仔的形式。例如以往警察會直接以姐姐仔為打壓目標，但近年，他們轉為打壓與性工作者相關的商業，例如網站、業主及地產，令性工作者無法經營，最終被趕絕，無以為生。這些「另類」的欺壓手法相信會不斷持續。

其次是姐姐仔在媒體曝光的限制。姐姐仔以往隱姓埋名，到現在敢於為自己爭取權益、發聲，其間最大的掙扎便是在媒體前表露身分的問題。直至現時，姐姐仔在媒體前仍然要掩飾自己的真實身分，主因便是社會對性行業仍存在偏見和歧視，一旦自己的身分曝光，不但自己，連

身邊的親人、朋友均會受人白眼和歧視。這令我們在鼓勵姐仔站出來說出自己的故事和遭遇時往往遇到不少困難。特別是面對家人時，她們的壓力就更大，因為很多姐仔除了是性工作者，亦是孩子的媽媽、父母的女兒，她們害怕自己的身分一旦曝光，家人所承受的壓力會更大。這往往是影響姐仔表露身分的最大阻力。

最重要的是，社會大眾對性工作的接受程度雖較以往為高，但對於核心問題——「肯定性工作者的工作權，接受性工作是工作」——顯然仍有一定的距離。大眾接受姐仔對警察濫權的控訴，但對於「性工作是工作，姐仔應該享有基本法律保障、勞工權和人權」時，大多仍採取保守的態度。例如我們多年來要求政府修改法例，撤銷針對性工作的法例，公眾對此便顯得抗拒，有關的倡議工作亦不得要領。

此外，減少居民與性工作者之間的矛盾，也是我們今後要做的。當居民與性工作者同住在一幢樓宇時往往會產生不少摩擦：例如居民投訴性工作者對居民造成滋擾，增加風化案。雖然這些極限很多都是基於對性工作的抗拒及誤解，但我們也教導姐仔要自律，避免對居民造成滋擾，加深彼此間的矛盾，並加強社區教育，讓更多人了解姐仔，減少對她們的誤解，使她們能夠融入社區當中。

此外，資源不足亦是我們的一大困難。多年來，我們都面對捐款不足問題，經費不穩，導致很多發展項目亦要受資源不足所礙，影響其成效；更甚者，到目前為止，政府亦因種種無理

的原因拒絕紫藤成為免稅團體，令我們不能公開籌款。因此，積極穩定資源是我們今後不能忽略的。

前景展望

我們深信，如果社會意識沒有改變，對性工作者仍存在偏見，則她們的處境便不能得到改善。因此，去除性工作者的污名，支持社會接受「性工作是工作」，仍會是我們今後的爭取方向。我們一方面會繼續爭取性工作非刑事化，即從事性工作再不是罪，性工作者能夠除去現時刑事污名，我們更會不斷參考外國的成功經驗，取它們的成功經驗注入本地的爭取之中。另一方面，我們亦會繼續從文化入手，把文化藝術活動和性工作互相扣連，讓社會大眾以多元化的角度去看性工作，重新認識及接納性工作。

與此同時，開拓社會對「性」的討論空間，亦是我們今後的其中一個工作方向。我們深信，要社會接納「性工作是工作」，能夠正常化地公開談性，打破大眾的性禁忌是重要的一環。因此，我們近期積極舉辦各類有關性愛和性教育的工作坊、設立性教育資源中心，給予普羅市民一個公開談性和增進性知識的機會，讓性不再成為社會的禁忌。

我們也會繼續紫藤一向最重要的工作，即是對抗警察濫權，教育姐仔如何面對警察的欺凌，並透過不同的渠道，如立法會、申訴部、聯合國等等，投訴警察利用職權「免費標」，用盡

一切可行的方式去表達性工作者的訴求，為她們爭取應有的尊重和尊嚴，並繼續呼籲不同階層的人士包括客人、基層人士等，和我們一同關注姐仔，支持她們爭取權益，身體力行參與支持姐仔的行動。我們也希望社會大眾能給予姐仔鼓勵和支持。最基本的是對姐仔有一份基本的尊重，視性工作為工作，視姐仔為社會的一份子，這對她們來說絕對是一份莫大的鼓舞。

踏入二〇一一年，紫藤也逐漸把不同的小組分離出去，包括負責一樓一工作的姐仔會、援交小組，她們都先脫離紫藤，分別獨立成為關注一樓一、援交的兩個社團。現時，紫藤主要仍有外勞、浴足的工作。我們希望，這些工作有朝一日能儘快獨立出去，紫藤便可以解散，完成她的任務了。

討論與提問

許雅斐（主持人）：非常精彩的演說，讓我們分享了賣淫的快樂，也讓我們看到多麼強的生命力才能形成亞洲最先進的性工作組織。我們現在開放提問。

與會者：我的第一個問題是，老師你說黑社會跟馬伕看起來不像電影那樣會打小姐，用毒品控制她們，這實際上是怎麼一回事呢？一樓一鳳之所以不犯法是因為她們獨立自主，要是有

了馬伕，就會控制性工作者了。第二個問題是，老師提到深圳過了關以後就比較開放，那深圳那邊的警察也會要錢，會勒索嗎？第三個問題是，有一個很大的社會張力是來自新移民進入香港，所以有很多新設的規則法律都是希望減少新移民的數量，請問是這樣嗎？

嚴月蓮：我接觸的黑社會和馬伕都是比較慘的，我接觸到的是傳統賣淫的灣仔的一個年輕人，他在英國念完書回來，必須繼承這個家族的生意，所以勉強在這個地方混，他跟我們談的時候就說過不想來幹的。當時站街的姐姐每天都要交錢給他，有次一個姐姐付不出錢，問他說能不能晚點給，他一口就答應了。我覺得這個黑社會還不錯啊。第二次我接觸黑社會是在九龍，也是有個站街的姐姐欠一個黑社會的錢，這段時間剛好是嚴打，她生意不好，連利息都還不起，她又很怕，就請我陪她一起去見這個黑社會。我跟大家一樣，在電視上看到的都是左青龍右白虎，我原先以為是有去無回，還跟同事交代了後事。去了以後，腳都在抖，可是對方也只是問我是誰而已，我就說我是她的朋友，你也知道在嚴打，最近生意不好，她拿不出錢，可不可以緩一緩？他就直接說，好啦，兩個禮拜後，你再來找我吧。我嚇了一跳，這樣就完啦？可是真的就是這樣。我的經驗裡面，我還覺得黑社會比明光社的人好很多呢。後來在鉢蘭街，就是馬伕很多的地方，姐姐們去店裡上工的時候，馬伕就會來我們辦公室這裡歇一下。有一次我在和一個馬伕聊天，那個馬伕接到電話，一個姐姐就說，你剛才幫我買便當忘記給我筷子，趕快送過來。我當時就在想，奇怪，到底他是老大還是她是老大啊？跟電影裡完全不一樣啊。電影

裡都是馬伏拿著鞭子要姐姐去接客，可是現在這裡卻是反過來，這個馬伏為了一雙筷子要乖乖的送過去給姐姐吃飯。在我的經驗裡沒看過黑社會拿鞭子在打，我想這個原因是跟一九九七回歸的大政治脈絡有關，這個時期很多大的黑社會開始「從良」，他們把錢漂白，開始放棄賣淫這塊，而且當時香港政府也嚴打，這種時候，電影裡面的黑社會和馬伏我真的沒見過。

深圳公安拿錢，這不是秘密。早期還有一些規矩，A B 兩個村，A 村的公安就去管 B 村，然後 B 村的公安就去管 A 村，因為村裡的房子租給賣淫的，我本地人再向你收黑錢，臉上就不好意思，所以就交換收，你收我的村，我收你的村，有人追問，就可以說不關我的事，不是我收的。這種就是一年收兩次，現在在天津，公安每個月都來收三百塊的報紙費，但一張報紙都沒有收到，你真的是沒辦法。我們天津的同事嘗試去處理，她就去報公安，我就在電話裡罵了她，說你去賊的地方告賊，怎麼會有用？現在中心要面臨關門，就是因為你碰了公安最不想你碰的東西，所以在國內沒辦法。

新的政策是不是和不喜歡新移民有關？其實沒有喜歡不喜歡，到現在為止，還是每天有兩百個名額可以進來，香港並沒有擋住新移民進來的意思。以前中國大陸會批港澳通行證，這個港澳通行證很好，姐姐可以進香港兩個禮拜，跳去澳門，再跳回香港，再跳去澳門，這樣一來一回就能有八個禮拜可以賺錢，成本也低，因為這個證是賣的。可是兩年前這個證就取消了，去香港就不批去澳門，去澳門就不批去香港，這樣成本就變高了，而且在香港也只能待七天，

沒有以前那麼長。有些從山區過來香港賺錢的姐姐，連鹹菜都從家鄉帶來，因為在香港實在太貴了，她們幾個人合租小房間，誰有客人就帶上去做，不買菜，只做一鍋飯配鹹菜吃，七天就是這樣過。

與會者：請問姐姐沒有勞健保，也沒有退休金，年紀大了怎麼辦？老師提到明光社，明光社是什麼單位？還有，姐姐有父母，可能有小孩，可能也會有男朋友，那怎麼面對家人？怎麼定位自己？做這行，會有年齡的競爭性，雖然現在有人喜歡年紀大的，可是在市場上要怎麼辦呢？

嚴月蓮：其實每個行業都有年紀大的問題，不單單只有姐姐面對。你說她們沒有勞保，一九六〇年在香港做勞工的，到現在也都沒有勞保，所以我們把勞動者的命運都一體看待，也不是說因為她們是因為做姐姐就「淪落」到沒有退休保障。

做這一行，經驗越豐富的其實越有回頭客，所以紫藤是百分之百鼓勵人繼續賣淫，我們會開學習班，指導她們去留住回頭客，這是我們的強項。我們也開拓市場，我們會比方說，教她們簡單的英文，像 how much；教她們用英文數數字，開拓老外市場，或者教她身體的各種運作方式等等。

姐姐怎麼面對家人，這是我們去大學講課時常常遇到的問題。其實我想問，你們什麼事情都跟家裡說嗎？沒有啊，有些事情我打死都不說的，因為說了更麻煩。所以「姐姐們」也沒必

要說啊，說了會更糟糕。像有個姐姐是新移民，小孩上小學，在學校很皮，學校就叫她去，說她小孩很皮，結果姐姐太老實了，就跟老師說，老師你可不可以幫忙教教我孩子？因為我上班時間很長，早上十點要到晚上九點才回家看他的功課。老師就問她在做什麼工作，她就說我做一樓一，第二天，不但她小孩知道，連全學校都知道了，所以說，為什麼要說呢？說了才麻煩。至於姐姐怎麼看自己，很現實，能賺到錢，能讓家裡生活，就好了。至於偉大的明光社，它的成立要感謝賣淫的和同志團體，它是一個基督教團體，因為偉大的特首是天主教徒，把教徒都拉進來，所以明光社就有很多錢，也有個免費的場所，就可以開很多班，訓練人來打擊同志和賣淫，就是這樣。

王蘋：我剛才聽到你說紫藤要解散，我當然知道不是說解散就沒有紫藤了，而是你們成立了很多不同議題的小組。我關切的是，這些分出去的小組之間的關連性是什麼？組織性是什麼？還有就是本地和外地來的性工作者之間有利益上的衝突，性工作者裡面也有更弱勢的，那些分開的小組如何運作解決衝突議題？

鄭亘良：我有三個問題，第一，剛才說到的本地和外地小姐之間的張力要如何處理？第二，像台灣未來要設立娼嫖專區，香港的性工作區域存在已久，那社區和社區之間的衝突怎麼處理？例如哥哥仔和姐姐仔跟社區衝突時怎麼處理？第三，香港只有七天觀光簽證，那過境來工作的小姐要如何處理？

與會者：我想問的是，台灣和中國都有幫性工作發聲的組織，像台灣的日日春，那紫藤在這十六年當中有沒有和它們互動交流影響？有沒有你印象深刻的交流活動？是不是有小姐們快樂聯誼，分享經驗之類的？

與會者：有時候客人會有特殊的要求，如果姐姐仔面對比較危險的性交模式要怎麼面對？還有聽說深圳那邊男公關比較不接男客，香港那邊怎樣呢？會不會也受到警察的剝削？

嚴月蓮：姐姐和姐姐之間的關係，其實和其他行業一樣，有些互相照顧，我有客人的時候，我打電話給你，過了三十分鐘之後你就打電話給我，我如果沒接，你就報警，有這種互助的關係；也有一些就是在我隔壁，你生意比我好，我就出門，在你門口拉你的客，我們經常碰見這樣的。最近這一兩年，經濟不好，姐姐的生意往下跌，然後有太多人入行，就會因為搶生意而互打，甚至有打賭隔壁姐姐眼睛的例子，我們只能在中間調停，希望她們能看得遠一點。

小組跟小組之間，我們就是幫忙成立，給兩年的資金，它們各有自己關注的點。至於團體跟團體之間，我個人有限的經驗就是，那要看組織者能不能合得來，如果合得來就會有來往，要是看不順眼，就是怎樣的議題也不會合作。比方說一樓一的姐姐就不太懂網上賣的，面對援交打進學校都很反對；另外，一樓一對於我們做外勞的工作真的是沒辦法溝通，她們經常都會問，外勞在我們門診做檢查，一分錢都不收，本地的會收，她們會覺得我們是幫外人，不幫自己人，但是這真的是沒辦法。可是我自己覺得，只要團體的實力平衡的話，矛盾是可以存在的

，可以辯論。像英國最近改法，親近一樓一，一起掃蕩站街的姐姐，這時候站街的姐姐就要回擊，否則就會完蛋。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考慮不要用同一個團體來關注這麼多不同的議題和人群，衝突矛盾一定存在，所以要分家，分開來還可以顧不同的事情。

跟社區之間的關係，我們一開始是跟能談的社區議員談，她們有時收到居民投訴，那我們就去看到底居民投訴什麼。有些人什麼都沒有，就是覺得不舒服有姐姐在旁邊，這就真的沒有辦法，如果他們覺得不舒服，那他們可以搬走，不可能要我們姐姐搬嘛，這絕對不能。你說客人按錯門鈴造成困擾，那我們就盡量把姐姐的門上貼某種標誌，請客人不要按錯。我們在客人小組也求客人記得戴眼鏡，按鈴的時候看清楚，有標貼的才按，不要給姐姐找麻煩，只能兩邊教育。有些時候客人急得不得了，我們就說，那你自己打飛機吧，真的不要亂按。我們只能透過客人的網絡，很具體的請他們體諒。

至於交流，當年我們有帶姐姐來參與台北公娼的抗爭，我們都有來。我們也有讓國外的姐姐組織來香港和本地的姐姐互相交流結盟，大家都在流動。現在有些國家看見這本書《出發前緊記：跨境性工作者手冊》，就不讓姐姐入境，因為書裡告訴你要去哪裡和哪些人聯繫，這就表示姐姐是要去那裡賣的。所以現在我們都叫姐姐把自己要去的那個國家的聯繫資訊自己抄下來，不要帶這本書。

我剛才講得好像很輕鬆，其實現在「每三個月就可以跟警察坐下來談」是用生命換來的。

約在三年前，連續有四個姐姐被殺，這是對紫藤也是對今天有很重大轉變的時間點，因為有四個人被殺，社會就開始產生憐憫，也就有人說要不要捐一些像老人隨身攜帶的警鈴。其實以前我們也試著找那個公司，問能不能便宜一點提供這個服務，但對方說只提供老年人，性工作者要港幣每個月一千元，實在太貴了。但是突然間死了四個姐姐，就有人開始談這個，可是最後價格沒壓下去，還是沒幫上忙。就是因為這種，所以我們會開一些學習班，不是教姐姐們怎麼跟人家打，而是具體教她在門背後要掛一件衣服，客人進來以後，你靠近門，他在裡面，發覺他有什麼動靜，你就趕快跑。還有，要把客人的衣服放在比較難拿到的地方，這樣你跑得比他快。為什麼我們要這樣說呢？因為我們的經驗裡，有些姐姐就是因為沒穿衣服而被殺被搶，因為她要考慮要穿衣服才跑，所以我們就要教她，穿不穿衣服真的無所謂。真的有個案是姐姐要追賊，但是沒穿衣服就跑出去，在路上叫打劫打劫。當時路人就說她是雞，所以不須要幫她的忙，第二天的報紙也只拍她的裸體這件事。所以不會有人幫忙的，只能自己想辦法，例如和住隔壁的姐姐講好暗號，知道你有客人的時候，如果敲兩聲就是不行了，敲三聲就怎樣怎樣，用這種方法來解決互相的安全問題。

好，「哥哥仔」有一個組織，叫做「午夜藍」，香港的哥哥仔不多，現在大部分是大陸過來香港做的。香港警察對哥哥仔相對好些，其實不太會對哥哥仔放蛇，因為他們怕回警局會被說是GAY，所以哥哥仔的空間比女的寬鬆很多。「妖」（跨性別性工作者）就更好，如果警察

放蛇遇到「妖」，回警局就更慘，跳到黃河都洗不清，人家會說你真的很急嗎？怎麼會跟「妖」混在一起？哥哥仔的價格一般都比姐姐高，也接女的，也接同性。

許雅斐（主持人）：非常謝謝大家，在這樣精彩的問答後，我們這場就在這裡結束，謝謝。

